

文史知识

我为什么研究元史

元朝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我国戏剧为什么在元代成熟

元代的四等人制

蒙古和蒙古族的形成

元代杂剧是怎样演出的

翁独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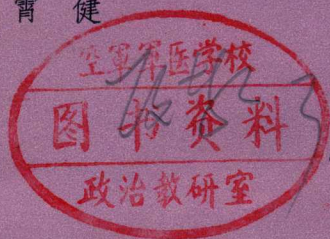
周良霄

黄克

丁国范

周清澍

徐扶明



1985

WENSHI ZHISHI

3



医药学院610 2 01496938

文史知识

1985年第3期

(总第45期)

· 元 代 专 号 ·

治学之道	我为什么研究元史	翁独健	3
	怎样学习和研究元史	蔡美彪	7
	元代文学说略	隋树森	12
· 历史百题 · 元朝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周良霄	17
· 文学史百题 · 我国戏剧为什么在元代成熟		黄克	22
· 怎样读 · “南曲之宗”——《琵琶记》		金宁芬	27
《元朝秘史》的流传与价值		亦邻真	32
诗文欣赏	高歌卑贱者的胜利——《西厢记·拷红》赏析	王季思	38
	冰丝带雨悬霄汉——读乔吉的《重观瀑布》小令	吕薇芬	42
	独具特色的散曲呈文 ——谈刘时中的《上高监司》	黄天骥	45
· 文史书目答问 · 元代的三部农书		徐莉莉	48
蒙古西征始末		余大钧	52
萨都剌及其诗词创作		范宁	59
文化史知识	元代的四等人制	丁国范	63
	元代的驿站(站赤)	陈高华	67
	蒙古丧葬习俗种种	梁甫	71
	行省制度浅谈	王頔	72
元代中国与欧洲的交往		陈得芝	75



人物春秋	建一代成宪的太保刘秉忠	白 钢	81
	急流勇退的小翰林贯云石	柴剑虹	86
	元末诗人和画家王冕	吴小如	91

白莲教与元末农民战争	杨 訥	95
------------	-----	----

- 文史信息 · 元代中日文化交流超过唐宋 (100) 金元之际 儒生的出路与贡献 (100) 古典戏曲精华、现代眼光评点 (101) 元代官刻大藏经 (101)

· 古代民族志 · 蒙古和蒙古族的形成	周清澍	102
---------------------	-----	-----

青年园地	关于元代历史地位的笔谈	内蒙古大学历史系学生	106
	进步与落后杂陈的时代 (韩振军)	应当充分认识元朝的	
	落后性 (张久和)	元代的历史贡献 (田建平)	

· 书画欣赏 · 黄公望及其《九峰雪霁图》	陈 黛	114
-----------------------	-----	-----

文史信箱	“色目”是一个民族吗	杨志玖	116
	元代杂剧是怎样演出的	徐扶明	118

· 文史古迹 · 一代天骄的象征——成吉思汗陵	哈斯查干	123
-------------------------	------	-----

元代科技文化重要成果一览表	125
---------------	-----

迎春征联一等奖佳联	94
-----------	----

补白 7 则	蒙古婚俗 (6) 囫囵吞枣 (44) 元代帝王世系表 (51) 得过且过 (58) 元时期全图 (113) 元代的科举 (115) 《元史》中的“拔都” (122)
--------	--

封面设计 张守义

《九峰雪霁图》(封二)	成吉思汗陵(封三)
-------------	-----------



我为什么研究元史

翁 独 健

翁独健，1906年生。福建福清县人。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毕业后入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现任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长。曾负责点校《元史》，主持《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的译校工作，组织并参加《蒙古社会制度史》、《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苏联历史纲要》中关于蒙古历史部分的翻译。目前正致力于《蒙古族简史》的定稿、《全元诗》的编辑与《马可·波罗行纪注释》的翻译工作，并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

我对蒙元史研究有兴趣是从大学时开始的。大学一年级听陈垣先生“中国史学评论”的著名课程，课上谈到十九世纪以来，有人标榜东方学、汉学研究中心在巴黎，当时巴黎有几个著名汉学家；后来日本雄心勃勃地要把汉学研究中心抢到东京去，当时日本研究的重点是蒙古史、元史。汉学研究中心在国外是我们很大的耻辱，陈垣先生鼓励我们把它抢回北京来。洪业先生说对中国史的研究，先秦、近代研究比较多，中间部分薄弱，尤其是辽金元史。在这种情况下陈、洪两位先生的影响下，我们同学中，聂崇岐选择了宋史进行研究，冯家声研究辽史，我则开始搞蒙元史研究。

在大学时对此产生了兴趣，我有机会到国外学习后，就集中注意这个问题。1938—39年，我从美国转法国学习，听伯希和(Paul Pelliot)的课。伯希和是当时对蒙元史最有研究的一位专家，他认为要搞

蒙史研究，要懂汉文、蒙文、波斯文、土耳其文、阿拉伯文、拉丁文等，也要掌握现代语言如英、法、德、俄、日文等。语言工具对蒙元史研究非常重要，我在大学和在国外把很多时间都用在掌握语言工具上。

蒙元史分为两个阶段：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到忽必烈建立元朝称为蒙古史；忽必烈建元到元末称为元史，二者有区别也有联系。蒙元史是世界性学问，因为当时成吉思汗一直打到中亚细亚，直到欧洲。俄罗斯被蒙古统治了二百多年（1240—1480）。蒙古的兴起对世界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中亚细亚在此后发生重大变化；欧洲转入近代史与蒙古对欧洲封建制度的沉重打击也有一定关系。在俄罗斯，莫斯科大公国就是在蒙古统治下“挟蒙古以令诸侯”，把许多割据势力统一起来而形成的，而后又推翻了蒙古统治。因此，很多国家研究蒙古史，使蒙古史成为世界性学问。马可·波罗来中国，回国后口授《马可·波罗行纪》，成为近代重要著作，引起了西方人对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强烈向往。这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有很大关系，因为哥伦布是想要找到令人神往的中国，结果碰到了“新大陆”。

元朝统治时间不长，但意义很大。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非汉族统一全中国，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从民族关系看，从领土疆域看，元朝都推进了重要的一步。

蒙元史共一百六十多年，这段时期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呢？过去有人说这段时间是黑暗时期，到底怎么看元代的历史地位，仍然存在争论，还要进行深入研究，但说成漆黑一团肯定不恰当。

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朝起了很大作用。唐朝国力强盛的时候，西藏还是与唐并存的势力，并不在唐朝管辖之下；直到元朝，西藏才真正从政治上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从汉代起，西南地区开始与中原有一定联系，而进一步开发，使西南云南一带变为中央的一个行省，直隶于中央政权，就是从元朝开始。在元代，蒙古高原、西北地区也有了和中央集权国家与前不同的关系，成为岭北行省。从交通、商业方面看，元代驿道四通八达，海外贸易在统一之后也得到保障，比前代有了很大发展。从整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

看，元朝起了很大的作用。

元代对社会经济是否有很大破坏？还要具体分析。在黄河流域，社会经济受到破坏，是辽、金时期战乱就开始了的，而蒙古南下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也无庸讳言。但元朝建立后，北方地区的经济也恢复得很快。蒙古对南宋的战争差不多经过了半个世纪，最后灭南宋时，南宋王朝已不堪一击，因而没有出现北方一样的大屠杀，南宋一方经济破坏不大，社会经济没有发生很大变化，元朝的经济破坏南北是有区别的。元代对农业相当重视，出了多种农书，又在边远地区开辟屯田，许多汉人迁往漠北，促进了西北地区的农业发展。

我国文化，在元朝也得到了发展，中西交通的进步，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西方的天文、历算、医学传到中国；而中国的许多发明也在蒙元时代传入西方。从文化交流与发展看，元代文化是有所发展的，而不是倒退。元朝的文化政策比较开放，没有听说兴起文字狱，这为元曲的兴盛提供了一定条件。元代宗教自由，并不用一个宗教压制其他宗教，一律平等看待。佛教、伊斯兰教、儒教、基督教等等并存，与中国历代王朝相比，元朝给人以思想比较解放的印象。

从宏观来看，元朝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功绩不可否认；从社会经济看，需要具体分析。评价元朝的历史地位，不能从汉族为正统的观念出发，要从整个历史看，才能对元朝的历史地位作出科学评价。

元朝实行“四等人制”，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列四等，好像是民族压迫最严重的时代了。但民族压迫的不平等关系在整个封建社会都是存在的。虽然蒙古统治者把人分为四等，不过应该看到元朝民族等级的划分是与元朝统一发展的过程联系着的，并且每一等都有上层与下层之分。汉人、南人中的地主、统治阶级仍与百姓有很大区别；而蒙古人也有沦为奴隶，被卖到海外的。民族关系应当用阶级关系来分析。

元朝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元史研究的地位，十九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开始了对元史的研究，研究的动机却可能不同。俄国曾被蒙古长期统治，蒙古史也是自己的历史；同时沙俄有扩张野心，向东扩张到

西伯利亚，与清朝也产生矛盾冲突，俄国一直想吞并外蒙古，对蒙古史的研究便下了很大功夫。日本对蒙古史的研究动机与政治有关，为确定“满蒙政策”，日本有南满铁路会社研究部，出了几个大的蒙古学家。西方如英、法，虽不是直接有企图，但对世界征服者仍不能不研究。然而中国过去并不重视，十九世纪下半期，开始注意蒙古史的问题。魏源《元史新编》是当时沙俄侵华引起的对边疆问题的注意的反映。中国最初注意元史的集中点是想改写元史；西方开始搞专题研究，中国也逐步如此。

蒙古史史料有蒙文、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这是元朝与其他朝代不同的地方，也是我们元史研究的薄弱点。洪钧写《元史译文证补》，注意到这个问题。研究元史，仅靠汉文不行，而我们直接从其他多种语言入手的力量还弱，从蒙文入手的研究也还不行，这方面仍达不到世界水平。蒙古史研究是世界性的，我们从建国后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如把波斯文的《史集》从俄译本译入，《世界征服者史》由英译本转译，而以后还要培养人直接从阿拉伯文、波斯文翻译才好。

我国元史研究最大的薄弱点是对元史资料和其他民族对元史的记载的掌握。要争取分工把材料系统引入，方便后人。同时也要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元史”文字及事实的校订工作。现在的研究者对历史理论与语言工具的掌握条件比前人都好，研究元史也后继有人，这是元史研究的极为有利的条件。我们对历史本身的专题研究等还要深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蒙古婚俗

据史书记载，蒙古人在男子求婚时须费很多口舌说服，才能征得女方的同意。婚后新郎须住女方家里，结婚宴席上新郎要吃羊颈喉肉，以示坚久。婚后如生男孩就在帐篷外挂上弓箭，如生女孩就挂红布。产妇生子后，七日之内不准动，二十一天内外人不得进入帐篷，以保持产妇安静。

(林 华)

怎样学习和研究元史

蔡美彪



蔡美彪，1928年生，1949年南开大学毕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1983年当选为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主编《中国通史》宋元明清各卷（已出第五、六、七册），另著有《元代白话碑集录》《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与罗常培合编）等书。

元朝从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到1368年被推翻，统治时间不算很长，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朝代，各方面都表现出一些新特点，很值得研究。

一、元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代元而起的明朝史学不发达，明初匆促修成《元史》后，除有人作过续补外，有明一代不再有学者研究元史。

清初的几个皇帝都很注意辽、金、元的历史经验，元史的研究渐为人们所重视。康熙时，邵远平仿纪传体编著《元史类编》（又名《续宏简录》）。乾嘉时，著名学者钱大昕运用考据学方法研究元史，他首先注意到元代的民族特点和蒙古氏族谱系，援用《元朝秘史》等蒙古史籍，广泛搜集

元代文集、碑铭和宗教史料，研究范围大为扩展。有关考订文章散见于所著《元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和《潜研堂文集》，专著有《元史氏族志》和《元史艺文志》。他还准备重修《元史》，但没有完成。这是元史研究的第一个时期。

第二个时期大略与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相当。这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于侵略我国的需要，倡导研究我国元代以来北方边疆的历史和地理。我国的爱国学者为抵抗外来侵略，更需要研究边疆史地，一时形成所谓西北史地之学。在这个背景下，元史研究有了新的发展。

这时，西方学者主要致力于汉文和波斯文蒙古史料的翻译。在法、俄、德等国，先后出版了波斯文拉施特《史

集》(或译《集史》)中蒙古史部分的分卷校订本和翻译本;《元朝秘史》也有了多种文字的译本。同时有一些综合性的蒙古史著述问世,如1824年开始出版的法国人多桑著《蒙古史》和1876年开始出版的英国人霍渥斯的《蒙古人史》。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著述甚丰,远超前人。魏源著《元史新编》(未全部完成),采录前人成果,参阅西方论著,补入《元朝秘史》、《蒙古源流》等资料,纪、传、志、表俱全,于光绪末年刊印。光绪时的驻俄大臣洪钧,据在彼得堡见到的俄译波斯史书,编成《元史译文证补》,这是我国学者最早应用西域史料编写的著作,扩展了中国学者的知识领域。另一学者柯劭忞以数十年之力,编成纪传体《新元史》。该书体例完备,补传尤多,但取材叙事,多有疏漏。与柯氏同时,屠寄撰《蒙兀儿史记》,屠氏诸子多通外文,故能广采汉、蒙及西域史料,工力在柯书之上,亦系纪传体,书未成而作者逝,已刊者有一百六十卷。这一时期我国的元史研究开始接触波斯史籍和西方著述,扩大了视野,但未跳出纪传体圈子,继续走重修《元史》的老路。

自1921年到1949年是元史研究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西方研究的新方向是:注重研究诸民族语言的译名还原、对音的规律和名物制度的渊源;注重对中亚诸民族史和东西方文化关系的专题研究。日本学者则加强了对我国东北和蒙古史地的研究。外国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对我国学术界的

影响增大了。王国维关于蒙古史的专题研究和史料校注,是这一时期较早的标志。陈垣的研究着重在东西方文化关系、宗教史和《元典章》的校勘上。冯承钧全文译出多桑《蒙古史》、《马可·波罗行纪》和法人伯希和等人的有关论文。邵循正曾直接翻译波斯文《史集》,可惜《成吉思汗纪》译稿遗失,只有《忽必烈汗纪》发表。韩儒林、翁独健、杨志玖等所写的考订文章,都已注意利用西域史料和对音勘同的方法,以诠释元代特有的名物制度,分别取得新的成果。蒙思明广泛搜集元代社会经济史料,写成专著出版。吴晗也发表了有关元代社会经济的论文。本期我国的研究状态是:1.从摘编发展到直接翻译、介绍西方学者的原著,并开始翻译波斯文史籍;2.从重修纪传体元史,转变为某些专题的探讨和史籍的校释。这使元史研究得以向纵深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把我国的元史研究推向了面貌全新的第四个时期。三十多年来,我国的元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是研究了元代历史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其中成绩显著的是关于蒙古社会制度的探讨。1936年苏联出版了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这是最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蒙古史的学术专著。解放后,此书受到我国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在研究方法方面,学者们得到许多启示。但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发现,

成吉思汗建立的国家，并非如符氏所说是自原始公社制直接进入游牧封建制，而是属于奴隶制性质。到忽必烈建立元朝才转变为封建制王朝，但在一些方面仍存在奴隶制残余。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它已为我国大多数学者所赞同。由此对元代社会的许多特殊现象得到了新的认识。这标志着研究已逐渐深入到对社会本质的探讨了。

第二是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开始把元史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断代史而开展了许多新课题的研究。研究元代农民战争的同志，在史料编纂、理论探讨和秘密宗教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少的成绩。学者们还广泛探讨了社会经济的许多问题，并在元代经济发展的估价方面，引起了不同意见的讨论。对元代的政治军事制度、法律等也作了一些较深入的探讨。元代文化，包括理学和戏曲的研究，成绩显著。蒙古民族史的研究，已从皇室谱系扩展到蒙古草原和云南地区的蒙族状况。对元代的藏族和维吾尔族的研究，也开始了某些工作。随着《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元代历史地理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各个领域的发展并不平衡，有些方面还不够深入。

第三是史籍的整理和翻译。最大的工程是完成了《元史》的校点。元代的文献和文集的整理，正在大规模进行。波斯文《史集》和《世界征服者史》的中译本陆续出版，这是自洪钧以来第一次把原著全文介绍给中国读者。

译本系自俄译本和英译本转译，对波斯文原本的研究和翻译，还有待展开。

二、研究元史的条件

从事一项工作，必须具备一些条件。研究元史的条件主要是：

第一，掌握研究方法，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并与本学科的实践相结合。从上述元史研究的发展过程看，解放前主要的进展表现为史料应用范围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改进，并不曾有历史观点的根本改变。解放后，我国史学工作者才比较普遍地学习、掌握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从而有可能对历史发展的本质获得规律性的认识。学习和研究元史必须掌握它，这就要求系统地直接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主要“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对于研究元史和蒙古民族史来说，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我们必读之书，反复学习，会得到许多重要的启示。马克思主义虽不能代替史料校勘、史实考订、译名勘同之类的专业研究方法，但只有在它的理论指导下，才能使我们的研究进入新的境界。

第二，要掌握较多的有关知识。研究元史当然需要有丰富的元史知识，这自不待言。但元朝是在消灭了西辽、西夏、金、宋和大理等国的基础上建立的，元朝的许多制度都是沿

袭金、宋而有所变革。研究元史，就需要深入了解金、宋、辽、夏、大理的历史。如果研究元代的专史——民族史、经济史、法律史、文化史之类，则需要相应地懂一些民族学、经济学、法学、哲学、文学等方面的专门之学。元代的另一特点是和亚洲周邻许多国家都有过战争，存在着各种关系，和东欧诸国以至罗马教廷也有联系。研究这些方面的历史，就需要了解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总之，要在专和通方面，横向(地域)和纵向(时代)方面，都具备较为广泛的知识。当然，人的精力有限而知识无穷，不可能面面俱通。但在研究某一领域的问题时，涉猎有关的知识领域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避免只把眼界和工力局限于这一朝代的毛病，而有利于打开局面，深入了解历史的发展变化。

第三，要掌握必要的语文工具。首先是汉语。元代是汉语“官话”(普通话)形成的时期，在语音学史上有重要意义。要阅读元代文献，必须了解当时的白话词汇，因为元代的蒙古语文献多用汉语白话词汇直译，多沿用宋、元民间俗语。这种词汇不见于古代或后世的字书、词书，需要根据宋、元的白话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才能理解其确切涵义。其次是民族语文。元代用蒙古文书写的文献，只有少数碑铭和文物传世。但汉文史料中记有大量蒙古语氏族名、人名、地名和各种名物制度的译名。《元朝秘史》还保留着蒙古语原著的汉文音译。因此需要懂一些蒙古语文的知识。如果

做深入研究，还要了解突厥语、畏兀儿语、藏语，现存大量元代藏文文献，尚有待研究利用。此外，学习外国语文也是必要的。如波斯、阿拉伯文。目前，我国元史研究者中，缺少精通波斯、阿拉伯文的学者，亟待有志之士的努力。如前所说，十九世纪以来，英、法、德、俄、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学者对元史研究做过不少工作，要了解他们的成果，当然要掌握他们使用的语文，至少掌握其中的一二种。

三、基本史料

中外所存元史史料很多，但汉文文献仍是最丰富、最基本的资料。简介如下：

一、基本史籍。研究蒙古先世和成吉思汗时期的历史，主要史籍是《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等书。《元朝秘史》原以蒙文写成，明初译成汉文。现存译本包括蒙古语的音译、词汇的旁译和分段的总译(意译)，大体上保存着原书的面貌，可与波斯文的《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等相互参证。研究整个元代的历史，《元史》是最基本的史料。但《元史》因成书时间短促，内容和体例都有不少疏失。不过它保存了丰富的原始材料，经过后世的订正补充，可靠性仍然较高。对此书还需要多下功夫。

二、官方文献。元代的官方文书，即后世所谓档案资料，仍有一些间接地保存下来，是第一手的材料。《元典章》、《通制条格》等书是元代的法律文献，大量的案例记录和文书，是研

究元代社会状况和各种制度的重要资料。自《永乐大典》辑出的《宪台通纪》、《南台备要》等书也都是元代的官方文书。元仁宗时官修的《经世大典》现虽已不存，但在《元文类》、《永乐大典》残卷和其它典籍中保存着若干片断，《元史》的《志》亦多据《经世大典》编修，尚可间接窥见概略。元朝官修的《大元一统志》也已失传，现有残卷的辑本可供利用。

三、私人著作。元代文人诗文集现存约三百余种，私人笔记，如陶宗仪的《辍耕录》等，保存了有关人物、传记、历史事迹和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的记述，颇有史料价值。要想知道这些文集的书名、作者，可以查阅近年出版的《元人文集篇目索引》。元代继承南宋的传统，民间流传一些日用百科式的丛书，如增编的《事林广记》、《居家必备》等等，是研究元代社会生活和文化习俗的有用资料。元代一些来华外国人的游记，也很有参考价值。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可·波罗行纪》。此书有多种文字译本，法国伯希和有详细的注释(英文)，对元代的一些名物制度做了考证。元代戏曲最为发达，作为史料看，也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一些侧面。

四、金石考古。分散在各地的元代碑刻文字，包含不少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其中既有元代官方文告，也有私人墓志记事。近代中外学者曾致力于蒙文碑铭的研究，大量的汉文碑铭，前人重修元史时曾予注意利用，但尚待广泛搜集整理，以供研究采择。近

年来，元代考古有不少重要的新成果，如元大都居民遗址的发掘、上都遗址的勘察以及蒙古和林遗址的考察，为都城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现存的文物，如元代的印本书籍、瓷器、书法、绘画、寺观建筑等，也都是重要的资料，可以从历史角度结合文献资料进行综合研究。

以上只是元代基本史料的概略介绍，如要从事某种专门研究，自然还有各个领域的基本资料，这里就不能一一论列了。需要注意的是，一般来说，研究能力的高低，主要表现在能否从最基本最常见的资料中发现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而不在于是否占有“珍本秘籍”。当然，这不是说不需要广泛地搜集新资料。新资料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掌握正确的观点方法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综合的研究工作。作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观点和方法有如我们从事研究的“能源”，历史资料则是待开发的“资源”。元史的资源是很丰富的，如果我们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开发它，定会在元史研究中开拓出新的领域，达到新的水平。



元代文学说略

隋树森



隋树森，山东招远县人。1906年生。抗日战争时期，西去四川，曾任旧教育部国立编译馆编审、特约编审等职。建国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

译著有几岛献吉郎《中国文学概论》、《毛诗楚辞考》，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概说》、《元人杂剧序说》等。校释有《全元散曲》，校点有《阳春白雪》等。

元这个朝代，不过存在了近两年。在这段时间里，各体文学也颇有发展。然而，自明代以来，有许多人都对元代文学持轻视的态度。什么“元无文”，“元无词”，“元诗不如唐”等等，不一而足，仅仅认为元人之曲是前无古人，后人也追赶不上的。但即使是给元曲以应有的评价这一点，也还是近几十年的事。在封建社会，文人学士们不大都也是摈元曲而不观吗？当然，反对上述偏见，对元代文学给以正确评价者，也大有人在。

今天的元代文学研究，是应该对各种体裁都加以注意的。从目前来看，研究者大多把精力放在戏曲方面，而对诗文等注意还不够。我认为应该加强对元代文学各方面的研究，使人们能够了解到元代文学的光辉灿烂。

其实，在元代这百年左右的短暂

时间里，文学在各方面都为 中国文学史作出了它的贡献。以下试就诗、词、文以及散曲、杂剧等诸方面，谈谈元代文学的基本状况。

诗 元人的诗，曾被人轻视，被认为总不如唐人。清初著名诗人及诗论家王渔洋对此很不以为然。他在一首论诗绝句中写道：“铁崖（杨维桢）乐府气淋漓，渊颖（吴莱）歌行格尽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他以杨维桢与吴莱的作品为例，认为元代也很有好诗，不应人云亦云，只听人们称赞盛唐诗的那些老调。只就量说，元诗也很丰富，不容轻视。清人顾嗣立纂辑《元诗选》（111卷）时，见过的元人诗集约有四百余家。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诏采遗书，当时海内秘藏，辄辏京师，顾嗣立所未见的元诗，大概不在少数。

元代初期著名的诗人，有赵孟

頔、元好问、郝经、杨奂、刘因等。其中以刘因、赵孟頔的诗成就较高。或以咏物来表达故国之思；或委婉地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尤其是赵孟頔的诗作表达了他矛盾、忏悔、抑郁的心情。如其《岳鄂王墓》中“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的诗句，更表达了他沉痛悲愤之情。元初的诗人们也常常以正义之笔，揭露、谴责蒙古贵族烧杀掳掠的暴行。

后来，诗坛出现了号称“元诗四大家”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在当时统领文坛，“声名满天下”。他们的作品当中，一些写景咏物诗尤为出色。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诗风清丽俊逸的诗人萨都剌，现存世的诗集有《雁门集》。虞集称他为最长于情的诗人，集中亦不乏豪迈奔放之作。

元末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元代诗坛出现了以王冕为代表的暴露现实、讽谕时政的诗人，同时也出现了倪瓒、钱惟善等为代表的逃避现实的隐逸诗人。王冕可以说是元代成就最高的诗人，有《竹斋诗集》传世。他的诗作有的反映元末江南人民的苦难，表达对人民的同情，有的对元统治者进行讽刺和抨击，有的表达自己蔑视利禄的心志，语言质朴、自然。元末杨维禎的诗也值得一提，他的诗在当时很有名，称为“铁崖（其号）体”。有不少诗作揭露了社会黑暗。

词 元继南宋之后，词家的作品亦颇可观，但也有人居然说元代无

词。这是说元词不足观，没有好作品呢，还是说元人没有词流传下来呢？无论如何，此说不公允。

明清两代，对元人词集注意者甚少。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明吴讷辑《唐宋名贤百家词》即有元人八家。清初侯文灿辑《十名家词》，即有元人三家，清末江标辑《宋元名家词》、吴昌绶辑《双照楼影刊宋元本词》、陶湘辑《影汲古阁钞宋金词七种》、刘毓盘辑《涵虚词》、朱孝臧辑《彊村丛书》都收有元词，而《彊村丛书》所辑元词尤富，达五十家。今人唐圭璋先生综合诸家，编成《全金元词》，收录了282家近3700首词。沉晦多年的元人词由是大显。

《全金元词》所收诸家中，成就较高者也颇不少。如赵秉文、杨宏道、刘秉忠、白朴、王恽、姚燧、张伯淳、卢挚、刘敏中、虞集、倪瓒、张雨、萨都剌等。元代可以称道的词家，实际还很多。尤其是萨都剌，其词的成就高于其诗。如《满江红·金陵怀古》，豪迈而带感慨，抒写了诗人吊古伤今的感受，用典贴切自然，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境界。

散曲 曲，就是乐曲。也就是歌唱的词。曲的起源很早，至晚在战国时代，就有这个名称。其句式往往长短不齐，歌唱起来，曲折荡漾，故称“曲”。元曲可分为杂剧和散曲两种，散曲当时也称为乐府或北乐府、小乐府、新乐府。以直抒胸臆为主。它是在我国北方发展起来的一种口语味较浓厚、流行于民间的雅俗共赏的歌

曲。作为新兴的文学，其作者不仅有名公贵人，也有一般群众以及歌儿、伎女等。根据散曲的结构，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小令，一类是套数。散曲有南北之分，而元散曲以北曲为主。

从蒙古太宗(1229—1241)取中原后到1279年灭南宋近五十年间，可算是元散曲发展的初期。初期的作者多为北方人，其活动的地区多在北方大都及中书省所属之地。其作者多见于《录鬼簿》卷上，有作品流传至今者，有元好问、刘秉忠、卢挚、关汉卿、白朴、姚燹、贯云石、张养浩等。初期的作品比较质朴，多属“盛元体”。中期是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所说的“一统时代”，从元世祖至元到元顺帝后至元间，约六十年。中期的重要作家有郑光祖、睢景臣、乔吉等。元散曲的末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至正时代”，至正是元顺帝的最后一个年号，共二十八年。这时散曲的作风已逐渐转变，渐失初期和中期作家那种浑朴本色的风格，趋于柔靡小巧。其重要作家有张可久、钟嗣成、杨维桢、倪瓒等。

元人散曲的思想内容是很丰富的，许多作品反映了元代这样一个封建专制统治严酷的社会现实。如无名氏小令《醉太平》，痛快淋漓地直斥当时腐败之极的“大元”政府，开河、变钞、法滥、刑重等苛政，指出“贼作官、官作贼”的社会现实。还有许多作品通过怀古、咏史，表达作家的政治态度：或抒发爱国之情，或表达不

与元政府合作的隐逸志向。元散曲中还有较多的作品是写景咏物的。元人散曲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元人制曲有不少的规则，不是随便写写的。但散曲的作者仍然创作了许多语言精炼、声调谐美、自然活泼的优秀作品，尤其是描写风景的小令，往往寥寥数语，读后就象看到了一幅精妙的山水画。其艺术之精湛，达到了非常高超的境界。

因为散曲是通俗文学，往往大量使用方言俗语、市语，有民间歌曲的色彩，有些普通题目，到散曲家手里，就能写成极本色的作品。诗词里不常用的词语和题材，曲家则往往用之。这就丰富了我国古典韵文的题材。

有人对元曲进行分类，就其文字风格来分，如“本色派”、“豪放派”、“文采派”之类，我觉得可以简化成为“本色”和“文采”两派。所谓“本色派”，其曲文以浅明直率、平实浑朴为主。曲中常用白话和方言俗语而充满生气。其作品是元曲的主流；其作家以初、中期为多，如姚燹、关汉卿等。所谓“文采派”，其曲文采华美，词藻绮丽，轻俊典雅。作者对曲辞的文字特别讲究。鲜于枢、白朴、王实甫、马致远、乔吉等，可属此派。不过，流派不宜分得过细，同是一个人的作品，其风格不尽相同。有的作品可归入本色派，有的又可归入文采派，这种情形也是常有的。

杂剧 杂剧是金元两代的统治者女真人、蒙古人入主中原前后发展

起来的一种极有生气的新兴文学。关于它兴起的原因，有种种说法，但如明清以来就有的“元以曲取士”之说，早就被考据家们所推倒。其他一些说法，也未能使古典文学研究者完全信服。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元曲不仅是当时新兴的一种文学，而且其成就在当时各体文学中占着最高的地位。清朝焦循在他的《易余籀录》中说：“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

这些话，已为研究我国古典文学者所熟知。王国维在他的《宋元戏曲史》中引用过这几句话，并进一步说：“余谓律诗与词，固莫胜于唐宋，然此二者果为二代文学中最佳之作否，尚属疑问。若元之文学，则固未有尚于其曲者也。”王国维所说的曲固然不排除散曲，但这里所指，主要还是杂剧。

元剧作家，《录鬼簿》所载者，共111人。其中有少数人只作散曲，没有杂剧。如张小山、不忽木等。元代的杂剧剧本，在当时一定为数不少。《录鬼簿》所著录的杂剧名，就有450余本。但今天实存的又有多少呢？现在《元曲选》有一百种（其中有六种为明人作，姑依书名仍算元人所做）。此外《元曲选》所未收的，尚有关汉卿的《关张双赴西蜀梦》、《关大王独赴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等，大约还有元剧六十种。这两部分加起来，共存160种左右。这些杂剧是否都为元

人所作？各剧的作者，是否都十分确实？还不无异议。有些问题，也很难作出使人们都信服的结论。

汇集元人杂剧最重要的书，应当首推《元曲选》。这部书中所收的杂剧，都经过明人臧晋叔整理过，后人读起来，方便得多。各剧都有宾白，故事的情节，表达得特别清楚。剧中人物的动作（科、介）也写得很完备。这对读者十分方便。

如果论及那些剧本刊刻时间的先后，那就应当首推元刊《古今杂剧》（亦称《元刊杂剧三十种》）为最早。从这部书，就可以看到元代曲本的面貌。

关于元代曲家的分期，前面谈散曲时已说过。元代杂剧作家也同样可以那样分为初期、中期、末期。

初期是元杂剧最繁荣的时代，当然也是元杂剧初兴的时期。《录鬼簿》把元曲作者分成七类，其第三类“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中的五十六位作家，都属初期，写过杂剧杰作的那些伟大的作家，绝大部分在此期。因此，这一时期最重要。关汉卿就是初期、也是元代最伟大的杂剧作家，他的作品无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着鲜明的特色和卓越的成就。他所作的杂剧，今可知者有六十余种。现在流传下来的，约有十八种。他的作品如《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单刀会》等，都是中国戏剧史上最杰出的佳作。另外，元初杂剧中，也还有很多颇具特色的作品。如高文秀的《双献

功》，白朴的《梧桐雨》、《墙头马上》，马致远的《汉宫秋》，李直夫的《虎头牌》，王实甫的《西厢记》，尚仲贤的《柳毅传书》，石君宝的《秋胡戏妻》，杨显之的《潇湘雨》，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李好古的《张生煮海》，张国宾的《薛仁贵》，康进之的《李逵负荆》，李行甫的《灰阑记》等，上述这些作品都有着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王实甫的《西厢记》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另外象《赵氏孤儿》、《灰阑记》等很早就传入了欧洲。

中后期较初期远为逊色，其中比较著名的作品有，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王粲登楼》，宫天挺的《范张鸡黍》、《七里滩》，乔吉的《金钱记》、《扬州梦》，秦简夫的《东堂老劝破家子弟》等。

除上述的作家及其作品外，现存的元杂剧还有四十余种出自无名氏。无名氏的作品中，也有一些杰作，如《陈州粳米》、《货郎担》等。

现在，在《元曲选》之外，又能见到六十来种元杂剧，这是很不容易的。笔者为方便一般读者，五十年代末，曾把分散在许多书中的这六十种的杂剧，编成一部《元曲选外编》，由中华书局出版。虽然其中有几种杂剧的作者到底是谁，是元人抑明人，有不同的看法；但这在元杂剧中，不是罕见的问题。这类问题的解决，尚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

值得高兴的是，现在离王国维写定《宋元戏曲史》，不过六十年光景，而他那时见到的元杂剧，只有 116 种，

今天见到的元杂剧，竟达 160 种之多！元剧的研究，在收集资料方面，我们的成绩是很可观的。

近数十年来，我们的元代文学研究，已获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有加强之必要。这些年来，对元代诗文的研究用力较少，对戏曲小说的研究较多。仅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1949—1966）》为例，从十七年间发表在全国报刊上的论文来看，对关汉卿及其作品研究，论文达一百三十余篇，对《琵琶记》的研究，论文不下四十篇，对王实甫和《西厢记》的研究，论文有四十篇左右。有关其他杂剧作家作品的论文，也有一些，相形之下，就少得多。至于研究元代诗文的论文，那就寥若晨星了。总而言之，就元代来说，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在作家、作品、文体等方面，投入的力量很不平衡。

因此，对于元代的各体文学作品，尤其是各体诗歌，各种文章，都应大力研究，使广大读者真正熟识它们，热爱它们。

